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许明龙主编

東方出版社

中西文化 交流先驱

——从利玛窦到郎世宁

许明龙主编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立群

装帧设计：王师颀

版式设计：朱 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

ZHONG XI WEN HUA JIAO LIU XIAN QU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3. 12

ISBN 7-5060-0421-6

I. 中...

Ⅱ. 许...

Ⅲ.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世界②名人 文化-生平事迹-世界③文化交流-中国、西方

Ⅳ. K812.4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 270千字 印数: 1—2000册

定价: 10.00元



利玛窦和徐光启像
(17 世纪铜雕版画)



艾儒略像



32 岁时的康熙像
(传教士所绘)



南怀仁像(1674 年)



乾隆像
(王致誠繪)



香妃戎裝像
(王致誠繪)



郎世宁绘《聚瑞图》



西方早期所绘中国地图

前 言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近几年又有了新的进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我们编撰了这部书，意在提供一些可靠的资料，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广义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但指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也包括中国与中国以西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本书实际上却仅限于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因而可以认为是取中西文化交流的狭义而用之。就狭义的中西文化交流而言，17、18世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在此之前虽然有过不少重大事件，诸如犹太人来华定居，景教东传，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等欧洲教士奉命出使蒙古，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传之久远的《游记》等等。但是，就规模和影响而言，这些事件均远在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高潮以下。中国与欧洲的这次文化交流高潮，除去序幕和尾声，起自利玛窦抵华，止于钱德明去世，大体上延续了二百年。

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客观原因，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高潮也不例外。走出了中世纪的欧洲虽然踏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生产力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期的中国，依然处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主宰之下，仅有些许资本主义的萌芽。然而，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和手工业却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商品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清之际中国的经济实力，领先于

欧洲诸国。正因为如此,欧洲一些强国尽管竭力向远东扩张,却几乎没有可供向中国输出的产品;而中国价廉物美的丝绸、瓷器等,却成为欧洲人竞相追逐的珍品。作为文化的载体,中国商品源源流向欧洲,在欧洲造成了经久不衰的“中国热”。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热切向往和深入了解的强烈愿望。如果说,欧洲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是造成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的主要原因,那么,应该承认,在这个高潮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便没有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高潮。一方面,他们将欧洲的各种信息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艺帮助中国人观察天文、绘制地图、铸造大炮,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译欧洲的学术著作,传授欧洲的音乐、绘画知识等等;另一方面,他们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向欧洲人作详尽的报道,大大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他们还在熟练掌握汉语的基础上,刻苦钻研中国经典,努力探索中国文化的底蕴,除了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寄回欧洲外,还将一些中国经典译成欧洲文字,在欧洲出版,极大地方便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进一步的研究。

欧洲传教士东来,是在欧洲早期殖民国家努力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派遣他们的国家和罗马教廷,都把他们当作建立和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工具。但是,稍作分析便可发现,不同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既有所同又有所不同。最初来华的传教士基本上只有一个目的: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文化交流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利玛窦之所以研究中国文化,传授西方学术,首先是为了结交中国文人和官员乃至皇帝,借以在中国不但站住脚跟,而且打入上层,进入宫廷,最终争取中国皇帝皈依天主教。因为,在他和他的同伴看来,一旦皇帝成为教徒,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便不会再受阻碍,他们的最高

奋斗目标——把中国变成天主教国家——便可实现。其次，利玛窦十分清楚天主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深感在中国人中间传播福音，规劝他们信奉天主教，绝非易事。他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努力在天主教教义和儒教之间找到尽可能多的共同点或相似之处，以此来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相信天主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同根同源。利玛窦如此，其他传教士也大抵如此，包括在传播西方科学、服务中国宫廷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人。17世纪下半叶以后来到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他们的先行者略有不同。传教固然依旧是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和首要使命，然而他们同时也是明确地带着文化交流的任务来到中国的。对于他们来说，文化交流既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手段，也是他们来华的目的之一。史实为我们这个说法提供了依据。在他们之前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都由教会派遣，而第一批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则是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以“国王的数学家”身份来到中国的。法国选派这批学者传教士来华，固然有迎合康熙皇帝的意愿，从而有利于开展传教活动的考虑，但希望他们用自己的学识为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却也是不可否认的原因。法国财政总监科尔贝在向这批传教士的领队洪若翰交待来华的任务时说：“希望你们珍惜这种机会，宣教之余，随时随地做些必要的考察和探索，使科学和艺术臻于完美。”当然，促使路易十四派遣这批耶稣会士来华的主要原因是与葡萄牙争夺远东势力范围有关，这一点既不能予以忽略，也不能因此而否认法国耶稣会士确实负有科学考察的使命。

无论是否将文化交流作为目的，17、18世纪来华的欧洲传教士，都程度不同地把文化交流当作“敲门砖”，借以取得中国人的信任，进而向他们传播天主教。其中耶稣会士对于文化交流的自觉性最高，贡献也最大。耶稣会在欧洲教会中属保守派，但来华的

各国耶稣会士却比其他修会的传教士灵活和开明。他们继承利玛窦的传统，乐于也善于入乡随俗，对教义和教规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尽量避免引起中国人尤其是皇帝的反感。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科学知识和各种“奇器”，使他们备受重视和尊敬。更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过“语言关”并不十分困难，他们中的多数人抵华数年后便对中国文化有了一些了解，少数人则不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还形成了某些具有西方人特点的见解。这就如虎添翼，极大地方便了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和为宫廷服务，并得以在文化交流中充分发挥作用。应该承认，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中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大于其他修会的教士。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部书中，耶稣会士占了很多篇幅。

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高潮中，如果说，西学随传教士来华而东渐，那么，教会各派之间关于中国礼仪之争则造成了人们始料不及的中国文化西渐的结果。

所谓礼仪，主要是指中国人敬孔和祭祖两件大事，而礼仪之争，则是指传教士们围绕着这两件事展开的争论。“礼仪之争”发端于17世纪初。利玛窦在世时，从有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着眼，认为中国人的敬孔祭祖纯系民俗，与宗教信仰无关，因而允许皈依天主教的教徒保留这种习俗，对于他们参加这类活动不加阻拦。利玛窦死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龙华民等人认为，敬孔祭祖的礼仪是迷信活动，力主严禁教徒参加。从此之后，传教士们便因在礼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而分成两派。赞成利玛窦的看法并继承发扬他的做法的为一派，几乎是清一色的耶稣会士。反对者为另一派，包括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个别耶稣会士倾向反对派的观点。礼仪之争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教徒可否敬孔？二，教徒可否祭祖？三，Deus译为中文应作“上帝”还是“天主”？这三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很复杂，实际上关系到对

待中国文化的根本态度。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了解孔子其人其事其学说，以及他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等领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至少需要了解中国人的宗教观、伦理道德观，尤其是以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为了回答第三个问题，必须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精深的研究，准确把握中国人对“天”的理解，这就涉及中国人究竟宗奉无神论、有神论还是自然神论等极为复杂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起初局限于在华传教士的范围内。但因双方各不相让，并先后作书或派人到罗马向教廷报告，以求裁决。从1645年至1669年，三位教皇先后各下了一道圣谕，英诺森十世否定中国礼仪，亚历山大七世表示认可，克莱门特九世则对他的两位前任的都给予肯定。教廷既模棱两可，争论当然无从停息。为了争取国内的支持，传教士们纷纷撰写书信、报道、论述，并以欧洲文字翻译汉籍，向欧洲人介绍他们各自心目中的中国。由宗教问题引起的礼仪之争，于是不但远远越出了宗教范围，成为全面讨论中国的一场大论战，而且从中国扩展到了欧洲，引起了许多非教会人士的关注，从而为他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丰富的资料。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研究，无不得益于礼仪之争。

应当指出，礼仪之争的背景实际上远比我们上面的简介复杂，它既反映了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势不两立的敌对情绪，也是天主教在华各修会互相争斗的结果。礼仪之争以耶稣会的彻底失败告终，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一落千丈，中西文化交流也随之跌入低谷。

在充分肯定欧洲来华传教士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外国学者对于中国人在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

用,即使不是有意贬低,至少有所忽视;而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很深入,以致于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自己同胞在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例如,当人们因谈到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史而提及《况义》时,往往把第一次将欧洲文学作品译为中文的功劳归在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一个人的名下。其实,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的这部《伊索寓言》的汉译手抄本扉页上赫然写着:“西方金尼阁口授,南国张麋笔传”,这就表明,此书的翻译是金、张二人合作的成果。又如,当人们提到徐光启等“三大支柱”时,往往强调他们从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这个那个,却很少提及他们给传教士提供了多少帮助。至于那些帮助传教士学习中文、研读汉籍,为他们捉刀代笔、润色文章的中国人,不但无人提起,甚至连姓名也不曾留下。徐宗泽先生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写道:“徐阁老对于教士学习语言问题帮助甚多,为教士聘请有名教授,其中一人谢绝世务,专心神业,竟习辣丁,以便更能有助于教士……”这位谢绝世务、专心致志教授西洋传教士的中国文人便不曾留下姓名,而像他这样的人又何止他一位。实际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累累硕果,无一不是中国人和欧洲人共同培育出来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这部书中写了几位中国人。徐光启和李之藻是直接参与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著名的中国学者,他们的入选是理所当然的。需要说明的是康熙、黄嘉略和高类思、杨德望。明末清初的中国皇帝,除雍正外,对欧洲传教士大多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这正是洋教士们得以在中国立足并做出成绩的首要条件。相比之下,康熙皇帝更为突出。他本人对东来的科学技术兴趣极浓,不耻下问,虚心向洋人学习。对于传教士的正当活动,包括传教在内,都以豁达的气度,不加阻拦,甚至提供方便。他充分发挥传教士的特长,组织他们测绘地图,研究《易经》,编译学术著作。他规劝传教士们摒弃宗派和门户之见,停止无谓的争斗。

他宽容大度地对先后来华的两位教皇特使以礼相待，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对于他们所传达的教皇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无理要求，他义正辞严地给以驳斥，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尊严。我们在前面曾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便不会有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高潮，我们同样有充分的理由说，如果没有康熙皇帝的积极支持，这个高潮不但不可能硕果累累，而且必定早早夭折。黄嘉略是广大读者乃至许多学者都感到陌生的名字，他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二百余年，只是在近二十年才被中外学者所注意。他的事迹表明，把中国文化传到欧洲去的，除了欧洲人之外，也有我们中国人。在欧洲汉学奠基人的名单上，应当添上这位中国人的名字。高类思和杨德望可以算作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在中国与法国的文化和科技交流中发挥较多的积极作用，但是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使他们甚至不敢透露曾经出洋的经历，当然更谈不上将他们在法国学到的知识用来完善中国的工艺了。

上文提到，礼仪之争产生了传教士们始料不及的效果：促成了东学西渐的高潮。然而，如果礼仪之争从未越出教会的围墙，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在18世纪的欧洲发挥如我们所见到的巨大影响。传教士中不乏饱学之士，但他们囿于宗教教义，不具备将中国文化与推动欧洲历史进程结合起来的眼光和能力。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是一批哲学家和思想家。入选本书的莱布尼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便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这三位思想各有特色。莱布尼茨生活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他对中国的兴趣主要是在哲学、历史、文字等学术方面。他如饥似渴地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中国的一切都令他神往，因为他相信，中国在许多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同属于被后人称为启蒙思想家的群体，他们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负担起了为巨大的社会变革鸣锣开道的历史任务。他们都十分关注中国，而且将研究中国与改造

法国结合起来,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探索可供法国借鉴和应该引以为戒的东西。有趣的是,他们从同一事实出发,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并且分别成为在中国问题上两种不同观点的代表人物,影响了与他们同时代或稍后于他们的一大批欧洲思想家。正是通过这些思想家对中国文化所作的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中国文化才得以在欧洲发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本书以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为指导思想,本着雅俗共赏的考虑,采取了以叙事为主的写法,一般不在文中就人物和事件展开有针对性的讨论。但因传主的情况各不相同,各篇的体例难以划一,有的以叙带议,有的夹叙夹议,个别的则以议为主。由于撰稿人数较多,对素材剪裁分寸的把握难以完全一致,所以各篇的繁简程度也有差别。另有一些本应入选的人物,如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在礼仪之争中作为耶稣会对立面主要代表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阎焄等,均告阙如。这些都要请读者予以见谅。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虽力求史实无误、评价恰当,但限于水平,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惠予指教。

本书的编撰者都是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们是(以姓氏笔划为序):尹建平、计翔翔、许明龙、刘立群、李兰琴、吴焯、张顺洪、张铠、孟华、顾宁、郝贵远、郝镇华、徐明德、曹增友、黄兰英、韩琦。每篇文末分别署有编撰者的姓名。

最后,我们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刘立群先生和东方出版社的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就难以与读者见面了。

许 明 龙

1993年3月

目 录

前 言	(1)
-----------	-------

在华传教事业的奠基人——利玛窦	(1)
-----------------------	-------

从澳门到肇庆(2) 从韶州到南昌(7) 南京 交游(12)

安居北京(17)

“西来孔子”——艾儒略	(27)
-------------------	--------

弃家修道, 东来中华(27) 避难杭州, 著书立说(31) 赴闽

传教, 被誉“西来孔子”(34) 西学东渐, 流芳百世(38)

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的先驱——庞迪我	(40)
--------------------------	--------

为获取在华传教权而奋斗(40) 介绍西方科学知识(44) 打

开加强东西方世界相互了解的窗口(47) 庞迪我的汉语研究和

主要汉语著述(54)

引进西学的先行者——徐光启	(61)
---------------------	--------

生平(61) 传教士的密友(62) 明末中国天主教之“柱石”

(65) 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与富国强兵(68) “苟利于国, 远近何

论焉”(74)

明代著名译著家李之藻	(76)
------------------	--------

生平(76)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活动(78) 结语(84)

杰出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	(86)
-------------------	--------

首次来到中国(86) 重返欧洲(88) 在欧洲的使命(90)

再次来华后的活动(93)

钦天监第一位洋监正——汤若望	(99)
----------------------	--------

2k13119
修订历书(100) 铸造火炮(102) 保护《崇祯历书》(104)

著书制器(105) 宠臣“玛法”(107) 蒙冤昭雪(112)

康熙与中西文化交流 (115)

西方传教士：皇帝的家里人(116) 复杂与矛盾：对天主教的态度(119) “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123) 中学西传(130) 未能实现的突破(132)

杰出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卫匡国 (135)

向往中国(135) 早期在华活动(136) 重返欧洲(139) 再次来华(141) 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142)

康熙皇帝的第一位洋教师——南怀仁 (148)

死有哀荣(148) 来华传教(149) 在历法之争中崭露头角(150) 巧运巨石通过卢沟桥(155) 为清政府造炮(156) 参与清政府的外交活动(157)

中国与波兰友好的使者——卜弥格 (162)

到神秘的东方去(162) 海南岛上的传教士(163) 在永历朝廷(164) 皇帝的使者(166) 闻名于17世纪的汉学研究(169)

康熙的洋钦差——白晋 (174)

以“国王的数学家”的身份奉派来华(174) 为康熙皇帝进讲西方科学(177) 奉康熙之命出使欧洲(178) 从中国古籍中索隐(181) 建立中国科学院的设想(185) 与莱布尼茨的通信(187)

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莱布尼茨 (190)

“狂热的中国崇拜者”(191) 醉心于中西哲学比较(195) 中国文字与世界通用文字(197) 《周易》卦图与二进制(200)

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及其在华事业 (203)

志向中国(203) 张诚与中俄尼布楚条约(204) 充任宫廷教师(210) 在华科技文化活动及成就(214)

与众不同的耶稣会士——傅圣泽 (219)

生平(219) 为康熙提供天文和数学服务(222) 在中国问题上的索隐派观点(225) 对中国历史的研究(229) 被迫返欧(231)